

木府：西南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

□ 杨福泉

在具有 800 多年历史的丽江古城，坐落着一座典雅大气的明代风格建筑——木氏土司府衙署（又称木府）。历经数百年风雨沧桑，木府已然成为丽江重要的文化坐标。它见证了明清时期丽江等西南边疆地区在木氏土司治理下，汉族、纳西族、白族、藏族等各族人民共同谱写的一段交往交流交融史。

木府的“前世今生”

明洪武十五年（1382 年），中央政府丽江古城设丽江军民府，丽江古城很快成为纳西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因为纳西族木氏家族在明代世袭丽江军民府知府，在此办公、生活，所以又称之为木府，即现在的木氏土司府衙署。木氏土司建成了规模宏大的官殿式建筑群，包括以石和木建构而成的 3 座大型牌坊、木家院、皈依堂、玉皇阁、三清殿、光碧楼、经堂、家庙、万卷书楼、玉音楼、议事厅等。清咸丰年间，木府大部分毁于战火。

1997 年，木府因其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和影响，获得世界银行贷款而开始重建，并于 1999 年落成。现在的木府占地 46 亩，中轴线长 369 米。这几个数字在东巴古籍中也常常提到，也是纳西族传统文化中的吉祥数字。主体建筑有木牌坊、忠义坊（石牌坊）、仪门、议事厅、万卷楼、护法殿（又称后议事厅）、光碧楼、玉音楼、三清殿、配殿、阁楼、戏台、过街楼、木家院、走廊、官驿等，大小 162 间屋宇，依山势逶迤分布在狮子山脚下，高低错落、起伏有致，自有一种山城古殿的独特风采。雕饰彩绘富丽古朴，黛青色琉璃瓦典雅庄重，彰显出一派明代古建筑的大气。恢复重建的木府气势恢宏，保留了明代建筑典雅大气的风格，再现了昔日这座丽江“紫禁城”的巍峨气势。

彰显各民族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

从建筑风格来看，木府将中原与本土建筑的特色进行了很好的融合。在整体布局方面，木府采用中轴线式

的规则布局，这是中原官殿式建筑的一大特征。中轴线上呈现这样的“三节”格局：前节包括忠义坊、仪门及官前广场等；中节即木府核心区，包括议事厅、万卷楼、木家院及后花园等；后节以狮子山结束。木府官殿式建筑群模仿北京紫禁城的建筑体制。一条河流从东南北三面环绕着木府，这也是模仿中原古代都城筑护城河的传统做法。环绕木府的这条河因形似一条长长的腰带，又名玉带河。府门前河流上的石拱桥，也仿北京天安门前的金水桥。木府形象地体现了明代中原官廷建筑那种伟梁大柱、拙朴浑厚的特色。徐霞客来丽江时惊叹木府“官室之丽，拟于王者”，可见当时他眼中的木府之巍峨壮观。木府建筑中的斗拱拙朴大气，是典型的明代中原官廷建筑风格，而木府里众多建筑的门窗和栋梁等雕饰，则又反映出中原汉文化与纳西族、白族雕刻艺术的融合。

木府虽模仿中原风格，但又植根于当地民族文化传统，没有效法中原“方形根基”的传统建筑模式，始终保持自然形态平面的特色。木府的坐向未按照以“坐北朝南”为佳的中原风水理论。纳西族拥有喜欢朝向太阳和东方属木的习俗。木为纳西族东巴教中的神秘崇拜物，亦为皇帝所赐纳西族土司之姓，有得“木”之气则盛的意蕴，因此木府采用坐西朝东的建筑走向。此外，木府并没有完全遵照中原王宫帝苑“居中为尊”、其余一切建筑皆须围绕王宫而建的规则。它别出心裁地僻处丽江城南一隅，而作为全城中心的则是商贾云集的茶马古道重镇四方街。如蛛网般纵横交错街道，像星光般从四方街这一最明亮的商贸中心向四周辐射。从中也可见出，丽江古城最初形成于乡村集市，最终也因商业贸易而繁荣的特点，这与古城千百年来作为“茶马古道”之重镇的历史密切相关，而木府的选址，也蕴含着古城最核心的地点应该是商贾云集的四方街的理性思考。

木府还见证了纳西族、汉族、藏族、白族等各族人民，在宗教、艺术等方面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在木府内，将一座巍峨而充满书卷气的“万卷楼”置于土司谈论国事家事的前议事厅与后议事厅之间，亦是木氏儒雅

博学、推崇文明的写照。光绪《丽江府志稿》称：“楼中凡宋明各善本以数万计”。木氏土司素以开门笑迎八方风，广采博纳各民族文化精粹著称于世，广泛收藏中原各种典籍。木氏土司曾在丽江刊印“大藏经”108 卷，使其得以广传于藏地，史称“丽江版《甘珠尔》大藏经”，在滇川藏的纳西族和藏族中传为千古佳话。丽江版《甘珠尔》大藏经是纳西族木氏土司和藏传佛教噶举派首领人物密切合作的成果，是滇西北以纳西族为主的各族人民与西藏人民之间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历史见证。藏族学者也认为丽江版大藏经的刊印，是滇藏政教关系史上的一大创举。

木府收藏有著名的明代白沙壁画较早的临摹作品，这是纳西族、汉族、藏族画工各施妙手的杰作。白沙壁画是明洪武至清乾隆年间纳西族人民的杰出创作，它生动展现了古代纳西族人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与融合，是多种宗教文化交织的璀璨结晶。在创作风格方面，白沙壁画融合了汉族、藏族、纳西族、白族等民族的绘画风格，既有汉族绘画的传统技法、藏族绘画的重彩浓墨，又有白族绘画的线条细腻流畅，还有纳西族绘画的粗犷与浪漫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活灵活现，人物栩栩如生。此外，白沙壁画的内容也体现了纳西族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兼容并蓄，是研究民族史、艺术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多元文化特征得益于木氏土司的开放包容理念

作为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缩影，木府的多元文化特征离不开历代木氏土司倡导的开放包容的治理理念。在统治滇西北近 500 年历史期间，木氏土司在滇川藏三地交界地带的多民族聚居区，实行开放、包容、和合的政策，加强了不同民族间文化的交流、融合，形成了互信、互惠、互助的民族关系，为促进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和安宁和睦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历史上看，以明代木公、木增为代表的众多木氏土司，善于广泛吸

收汉族和藏族、白族等各个民族的文化。他们通过广交中原名士，从内地引进文、医、教育、建筑、开矿、工艺制作等方面的汉族人才，引进大量的汉文典籍。丽江古城相当多的居民是明清时期移民至此，后来逐渐融合于纳西族中的汉族人士。此外，白族木匠、石匠、铜匠、商人、农户等也曾大量流入纳西族地区，促进了纳西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木氏土司一直以开放的态度接受和学习汉文化。根据史书记载，丽江在明代曾有过教汉文的学校，徐霞客到丽江时，木增请他在汉学上指教其子，以“窥中原文脉”。明代学人章吉甫曾撰文称赞木氏土司云：“世著风雅，交满天下，征文者，投诗者，购书者，以神交定盟者，嚶鸣相和，声气往来，共中原之旗鼓。”一些木氏土司还成为杰出的用汉文写作的诗人和散文家，《明史·云南土司传》载有“云南诸土官，知诗书好礼守义，以丽江木氏为首。”纳西土司木公的诗入选沈德潜所著《明诗别裁》，木公、木增等人的诗集入选《云南丛书集部》及《古今图书集成》等书。木氏土司的汉文著作成为研究明代各民族汉学和汉文诗词对少数民族上层影响的宝贵资料。

在木氏土司强盛的明代，滇川藏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贸易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各民族之间也通过相互通婚、聚居或杂居而不断融合。纳西族木氏土司历经元、明、清三朝共 22 代，传承 470 年，从他们的婚姻上看，实行的是与多民族的通婚联姻。纳西族与藏族、白族等民族之间通过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彼此以兄弟相互认同，著名的“茶马古道”上留下了很多纳西族、藏族、白族等民族亲如兄弟的故事。这样开明的民族政策和通婚政策，促进了西南地区的民族团结和安宁和睦，也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地区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

（作者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浙江仙居下汤遗址：揭示早期农业社会样貌

□ 仲召兵

在距今约 11700 年的全新世，全球气候变暖，世界主要农业中心开始形成。东亚出现了以长江、黄河为中心的农业社会，并且形成了“南稻北粟”的多元格局雏形，从而开启了中华民族一万年文化史的新篇章，浙江仙居下汤遗址就是这一篇章的重要一页。

下汤遗址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横溪镇下汤村，四面环山，东西邻水，南面约 2 公里为浙江第三大河——灵江。遗址坐落在盆地中央一处台地上，高出周边农田 1—2 米，文化层堆积厚达 2.5 米，总面积约 3 万平方米，目前累计发掘面积 2250 平方米。历年发掘工作表明，下汤遗址包含上山文化（距今约 10000—8300 年）、跨湖桥文化（距今约 8300—7000 年）、河姆渡文化（距今约 7000—6000 年）、好川文化（距今约 4500—3800 年）四个阶段，是目前我国唯一一处时间纵贯新石器时代（距今约 10000—4000 年）始终、前后延续 5000 多年的史前遗址。下汤遗址是中华民族一万年文化史本土起源、连续发展的重要实证。

展现稻作农业长江流域起源的全过程

长江流域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上山文化是其下游的农业起源地。最近，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吕厚远团队，通过对上山文化遗址群的野生稻进行采样、研究，揭示出一段长达 10 万年的水稻从野生到驯化的连续演化史。研究表明，上山文化遗址群早在 10 万年前便已存在

野生稻分布，约 2.4 万年前开始利用野生稻，约 1.3 万年前开始栽培，约 1.1 万年前出现驯化稻。

下汤遗址生土层中发现了距今 30000—15000 年的野生稻，在上山文化时期地层中发现了较多的水稻遗存。据统计，其中驯化稻的比例高达 75%。下汤遗址具有连续的考古学文化，经历了从稻作农业起源阶段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高度发达的整个发展历程，为研究稻作农业起源全过程提供了重要实证材料。

廓清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社会的聚落样貌

由于遗址保存状况、发掘面积有限等原因，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社会的聚落样貌我们并不清楚，下汤遗址的发掘填补了这一空白，揭露了上山文化中晚期聚落的布局与演变。

遗址中西部为相对独立的中心台地，中心台地的外围围绕着 10 余座上山文化时期人工堆筑的土台，再外围则是环壕，总体上呈现“中心台地—外围人工土台—环壕”的三重聚落结构。

具体来说，中心台地上发现上山文化中期房址 4 座，食物加工场遗迹 1 处，沟渠、沟槽、道路各 1 条。房址分圆形和长方形两种。圆形房址采用挖槽栽柱的方式，长方形房址为基槽式地面建筑。在食物加工场，则是发现了多处集中放置的石磨盘。房址与食物加工场侧畔的沟渠，让小桥流水人家的场景跃入眼帘。时至上山文化晚期，中心台地则演变为红烧土“广

场”，广场上发现器物坑 20 余座。器物坑是上山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下汤遗址是目前出土器物坑数量最多的上山文化遗址，根据器物坑特点推测其功能可能与丧葬行为有关，或许为特殊形式的墓葬。

外围人工土台一般用纯净的黄褐粘土堆筑而成，大多呈东西向的长方形，长约 8—10 米，宽 5 米左右，现存高度约 0.4—0.8 米，大体呈南北向排列在中心台地的北部和东部。这些土台上目前已揭露房址 2 处、灰坑 23 座、器物坑 28 座，高等级墓葬 3 座。环壕宽约 10 米，深约 2 米，壕沟内出土大量陶片、石制品、动物骨骼和植物遗存。壕沟内侧沿岸和沟底分布较多的坑，多为近圆形，凿破砾石层，初步判断可能为食物加工或储藏的设施。

揭示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社会组织结构和发展程度

在黄河流域，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揭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各社会单元围绕中心广场的向心式聚落结构，据此可以推演当时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尚不清楚。下汤遗址是目前我国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聚落要素最为完备、结构

最为清晰、内涵最为丰富的遗址之一，为研究我国南方早期稻作农业社会及与北方早期旱作农业社会的比较提供了重要的样本。

下汤遗址揭示了距今 9000 年左右新石器时代早期众多人工土台围绕中心台地有序分布的聚落形态及其动态发展过程。外围人工土台上分布有房址、器物坑、储藏坑、食物加工设施、高等级墓葬等遗迹，各土台可能对应于基本的社会单元，尽管目前难以确定这些社会单元的家庭形态和规模，但这样的聚落形态无疑是其新石器时代早期社会结构的表征。

更让人意外的是，考古工作者在中心台地外围东部的土台上发现了 3 座上山文化晚期高等级的墓葬。墓坑呈长方形，东西向或南北向。随葬陶器较多，均在 20 件以上，器形主要有平底罐、圈足罐、大口盆等，有的墓葬还随葬石器。从随葬品的数量看墓葬等级较高，说明在稻作农业经济的支撑下，在距今 9000 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上山文化社会较早地出现了社会分化和不平等现象。

下汤遗址升起的炊烟，象征着农业革命的完成和一个新的人类发展时代的开启。尽管目前所揭露的只是聚落的一角，但我们依旧能瞥见距今约万年之际人类早期家园的图景，感受到早期农业社会加速发展的时代脉搏。

（作者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下汤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



从考古看文明

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世界，并迅速赢得西方读者的认可和青睐，汉学家贡献颇丰，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便是其中重要一员。葛浩文不仅是著名的萧红研究专家，而且为助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出重要贡献。他以作家研究为起点，以翻译实践为依托，以译促研，形成了独特的跨文化交流互鉴路径，是英语世界当之无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活化石”。

将萧红等东北作家作为文学研究方向。1971 年，葛浩文进入印第安纳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主攻中国现代文学。彼时的美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印象较为模糊和刻板。至于萧红，无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亦并无多少知名度。但是，葛浩文却独具慧眼，推崇这位东北作家，认为她不仅经历传奇，也最具天赋，甚至直言“萧红是我的缪斯”，并将萧红及其文学作品作为博士论文研究对象。他从骆宾基等萧红朋友圈的回忆或有关传记中梳理材料，考证萧红生平，甚至还专程飞往香港和台湾，访问萧红生前好友，搜寻有关史料。1974 年，葛浩文顺利完成论文，并在两年后，如愿以偿出版了《萧红评传》。这既是葛浩文的首部著作，也是国内外最早研究萧红的专著。《萧红评传》不仅翔实客观地再现了萧红短暂而又传奇的一生，也深入探讨了萧红的创作技巧、作品主题、文学风格，并重点关注了作品中蕴含的东北情调、女权思想和伟大抗战精神等。专著被收录为世界文学经典作家传记丛书，让萧红在美国悄然走红。

在研究萧红期间，葛浩文就已经着手翻译萧红作品的一些片段。专著问世后，他专注于翻译，先后出版了《生死场》《呼兰河传》《回忆鲁迅先生》《萧红短篇小说选集》等译作，让英语读者可以一睹萧红独特的文风文采。他还发表《谈萧红与鲁迅》《萧红与阿 Q》等论文，在学术会议上公开演讲宣介萧红。这自然吸引了国内学者的注意，进而引发了国内萧红研究热，重塑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令即使没有看过萧红作品的中国读者，也熟悉她的名字”。

从萧红研究出发，葛浩文逐渐将研究视野拓展到东北作家。他曾计划撰写《东北文学史》《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希冀挖掘东北作家笔下的地域独特性和时代特征。在《中国现代小说概论》中，葛浩文专辟一节详论李辉英、萧军、萧红和端木蕻良四位东北作家，认为李辉英是东北作家群的“先行者”，在文学发展历程的坐标体系中确定了他的位置。他高度赞誉端木蕻良在东北作家群中的“翘楚”地位，要比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夏志清的“首肯”来得更早。葛浩文对东北作家的研究和译介，让他们在英语世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随着葛浩文在汉学界的声名鹊起，他的视线逐渐转向中国当代文学。1988 年，根据莫言《红高粱家族》改编而成的电影，斩获国际“金熊奖”，这让已经关注莫言很久的葛浩文激动不已，决定找莫言合作，寻求版权，译介这一小说，并成功于 1993 年出版译作。译作好评如潮，被赞为英语译界里最好的 20 世纪中文小说之一，并入选企鹅现代经典丛书。此后，葛浩文先后翻译了莫言的《师傅越来越幽默》等 12 部小说（集），俨然成为莫言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代言人”。

平均每两年推出一部莫言译作，让莫言及其作品在英语世界获得广泛赞誉。观其译作，葛浩文很好平衡了原作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在葛浩文细腻笔触和生动语言的演绎之下，莫言笔下那魔幻现实主义的乡土中国，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异域风情，而是生动鲜活、触手可及的日常，如将农村里的“鸡飞狗跳”逐字翻译为“chicken squawking and dogs yelping”。对于中国独特的文化历史信息，他选择尽量保留原文的句子结构，如将“酒坊”音译为“jiufang”，而非“wineshop”，必要时辅之以阐释性译文，以助海外读者理解，使莫言作品在跨文化传递中保持了独特的中国味道、中国气息和中国风格。为此，他还多次写信咨询莫言，了解一些词语和事件背后的意义，征求翻译意见。葛浩文以他对语言的敏锐感知，将莫言小说中的野性与悲壮、伦理与挣扎、现实与魔幻，——转化为英语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活化石』——美国汉学家葛浩文：

□ 李震

世界的语言韵律，让那些原本只属于黄土地的悲欢离合，触动了无数海外读者的心弦，为莫言在世界文学界积淀了良好声誉。

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葛浩文一生都致力于翻译、研究、推介当代中国，让世界读懂中国当代文学。他多次与编辑高克毅、宋淇，以及作者杨绛沟通联系，以期完美再现《干校六记》中幽默而又辛辣的笔调、细腻而又富含寓意的风格。他与夫人合译毕飞宇、阿来、刘震云、朱天文等人的小说和《推开窗户：中国当代诗歌集》，不断向英语世界输送中国当代诗歌优秀译本。从现实主义到魔幻现实主义，从乡土文学到都市文学，从台湾作家到大陆文人，葛浩文均有涉猎。葛浩文深知，每一部作品背后，都承载着作者对于时代、对于人性的深刻洞察与独特表达。因此，他在翻译时总是力求保持原汁原味，同时又不失时机地融入自己的理解与感悟，使得译作既忠实于原作，又富有新的生命力。所译书单宛如一部中国现当代作家“名人录”，深深融入西方读者的阅读书单之中。

1995 年，葛浩文编译出版了《中国当代小说集》，介绍了改革开放后活跃在中国文坛的 20 位作家的作品，如余华、史铁生、苏童等。同年，他和刘绍铭合作出版了《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收录了 1918 年以来 83 位作家的 152 种作品译本，体量丰富、体裁全面。选集于 2007 年修订再版，增补了 1976 年之后的一些文学作品，特别是 21 世纪之交新鲜出炉的小说、诗歌。囿于选材标准、眼光、容量等原因，选集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瑕疵，但不可否认，它已成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参考、西方大学教授中国文学的重要教材。

葛浩文的学术探索与翻译实践交织交融，既引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也为西方读者构建了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桥梁。他曾谦虚地说，翻译“可能是世界上我唯一做得好的事”，但葛浩文一直在用研究之光、翻译之灯，照亮世界了解中国之路，他的名字已经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紧密相连。



海外汉学家